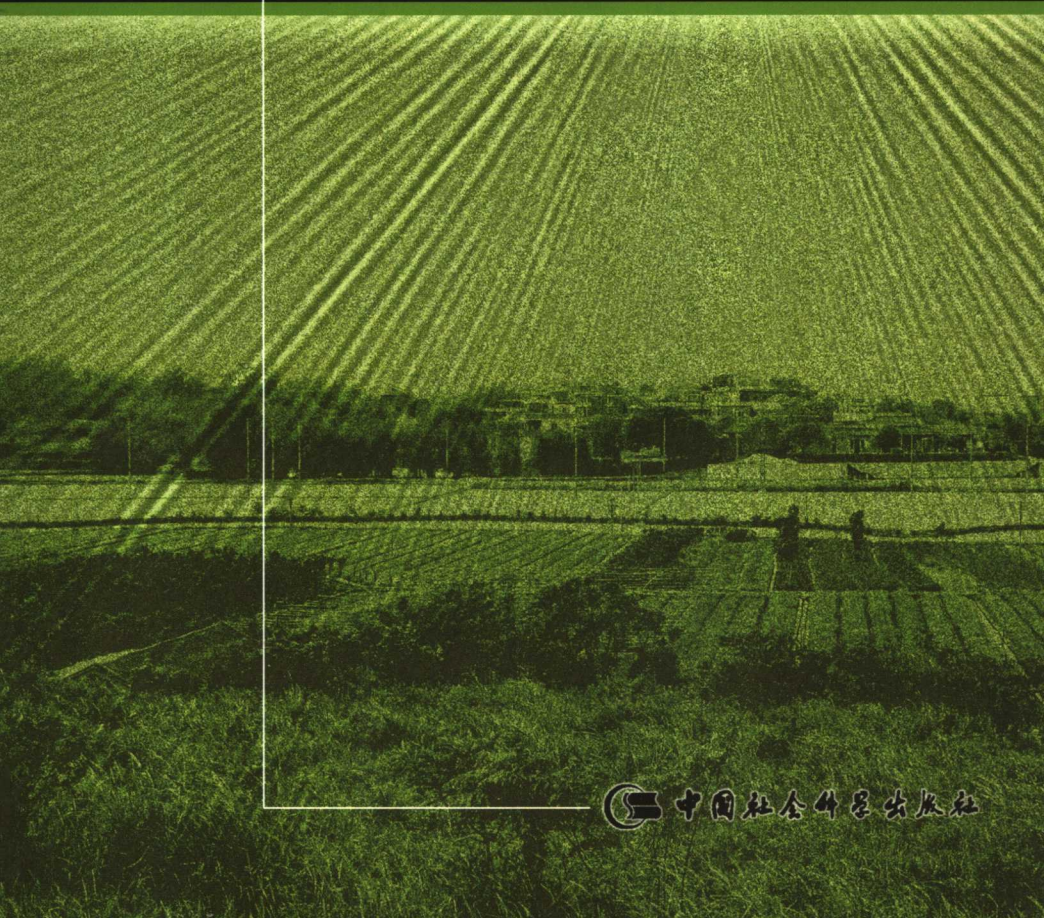


周大鸣 主编 华南城乡社区研究系列

塘村纠纷

一个南方村落的土地、
宗族与社会

■ 杨方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南城乡社区研究系列

周大鸣主编

塘村纠纷

一个南方村落的土地、 宗族与社会

□ 杨方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塘村纠纷：一个南方村落的土地、宗族与社会/杨方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

ISBN 7-5004-5457-0

I. 塘… II. 杨… III. 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IV. 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0627 号

责任编辑 王 茜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2

字 数 239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人类学传入中国虽然已超过整整一个世纪，但人类学学科建设的真正发展则是近年的事。而学科建设中最具有显示度的是博士点的建立。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大陆唯一的博士、硕士和学士授予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也招收人类学博士班学生），直到1998年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建立起人类学的博士点才改变这种局面。几乎是同时，台湾的清华大学（1997）、台湾大学（1998），香港科技大学也开始招收人类学博士班学生。

近几年来，人类学学科点在更多的大学建立起来，如博士点除原有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外，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清华大学也有了人类学博士授予权；人类学硕士授予单位已经超过20个，如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中南大学、青海民族学院等。实际上还有许多人类学方向设在别的学科点下招收博士生、硕士生，如复旦大学招收“体质人类学”博士生和文学人类学硕士博士生，中国音乐学院招收“音乐人类学”博士生、硕士生，中国刑警学院招收“法医人类学”博士生、硕士生，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收“艺术人类学”博士生、硕士生，华南师范大学招收“体育人类学”博士生、硕士生等不胜枚举。其次是人类学研究机构增多，如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更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成立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以及一批民族院校等也相继成立了人类学的研究机构。

一批批人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追寻人类学之梦踏入人类学的大门，他们又将带着或许更多的追问去开创 21 世纪中国人类学的新局面。综观近几年来国内一些人类学研究生的培养，研究生的选题以及学位论文，不管研究的专题如何多样，就对学科本身的发展而言，最后总绕不开某些相通的学术关怀。总结起来，那就是：（1）田野调查，（2）社区与区域研究，（3）历史人类学研究，（4）应用研究。我认为在这里仍有必要对这四个方面做一个客观的审视。

一

田野调查（fieldwork）被誉为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中国人类学秉承了这一传统并贯穿于学生的培养之中。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人类学 8 个学分，考古学 12 个学分），也是硕士（硕士田野调查时间不少于 3 个月）、博士（博士田野调查时间不少于 10 个月）研究生的基础课程。国内各兄弟院校对田野调查也有相关的规定。

作为以异文化研究起家的人类学来说，不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无异于纸上谈兵。田野调查虽然被国内人类学者和相邻学科广为接受，但在中国讨论如何深刻认识田野工作的意义如何真正做好田野工作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涉及田野调查的目的和基本要求问题。人类学田野工作是用直观的方法观察人类行为，通过介入式的经历以及不同社会人们的深入交往来研究一种文化。尽管人类学田野调查有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但基本假设即为人类学者研究的深度如何完

全取决于在工作中被研究对象接受的程度。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需要研究者与其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上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即使研究本文化或者研究自己生长村落的“家乡人类学”，同样需要高质量的田野调查。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很早就认识到，他谈到其在学社会学的过程中，就明白了必须联系实际到社会实践中去观察、分析、思考，因为实地调查方法是从人类学里学来的，所以他认真去找人类学家学习，师从史禄国教授。考虑到具体的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本身具备的条件不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具体的时间要求，但离开了观察的准确性和深度，田野调查就达不到预期效果。

其次，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按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方式，可以说长期以来国人主流思维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大一统和同一性思想的“大传统”影响，从“天下为己任”、“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话语可以看出，儒家追求普世的法则，强调同一性，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读书人和知识阶层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忽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小传统”和民间文化中还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已经为前人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已经写在书本上了。我们若不能接受这两个假定，自然应该另辟新路”。^① 笔者认为中国国情非常复

^① 张冠生：《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杂，人口和民族众多，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群体的亚文化丰富，了解这样多元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今天，田野调查的新路早已由前辈学人开辟，但仍需发扬光大才能更好地推动 21 世纪人类学的发展。

再次是田野调查的“兼容并包”问题。调查研究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田野调查方法也不只为人类学者独擅。从认识论上讲，田野调查的认识基础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相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引入认识论，掀起了认识论的一次革命，揭示了认识的能动反映性、社会历史性、辩证发展性特征。而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由于“实践”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黄宗智称：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视社区田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只有人类学才用这样的认识方法，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就是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①当然，我们说因为研究主题不同、目的不同，一般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没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求高，其往往追求通过调查达到对单个问题透彻了解的目的，而人类学往往从整体观去研究文化，去展开调查，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虽然有时偏重于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如宗教行为等，却会很自然地意识到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和其他方面相联系的。就宗教而言，一种文化的宗教信仰不仅影响着该文化的公开宗教礼仪活动，而且与他们所吃的食物、各种日常活动、家

^①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

庭结构等都有联系。人类学家可能会强调文化和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但一个文化完整的特征是不能通过孤立的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而认识的。尽管如此，不同学科甚至党政机关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总结的调查研究方法仍然需要人类学去正视，在批判中借鉴其精华。因此，人类学不能故步自封，盲目自信和自闭，要吸收别的学科实地调查积累的经验，同时也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好方法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

第四，田野工作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基础，但它并不是人类学家唯一的职责。人类学家一方面应用自己的工作得来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尤其是有鉴别能力地运用其他同行的成果和一切文献资料，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历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之一。

二

人类学博士论文以小型社区切入做深入的文化分析的民族志研究比较多。这就引出了人类学所研究的个案的代表性问题和研究视野的问题，甚至有人误以为人类学的研究仅仅是个案研究。有必要澄清的是，人类学绝非简单的个案研究，人类学从不缺乏宏大视野。就学术训练来讲，比较好的途径是走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的路子。民族志并不等于个案材料的堆砌，也不是简单的经验性研究，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出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① 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人

^① 马凌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们孜孜不倦的话题，也是人类学家致力于回答的问题，而发现“文化的规则”是人类学家解决“人是什么”的钥匙，是人类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发现“文化的规则”需要有更加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人类学创造了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入手的方法。通俗一点讲，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其实就是从点到线到面的研究。从人类学早期的学术渊源来看，一直存在着从点到面的研究和点面结合的研究，来回答与人类有关的宏大问题。人类学进化论学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可谓极具宏大视野，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形式放入一个线性的模型中，线性模型的两极分别是先进（文明）与落后（蒙昧），这样世界上已知的一切社会形式包括现存的和历史记载的都可加以比较衡量，而当时现存的原始社会无异于研究人类“落后”阶段的活化石，因而需要进行点的深入调查和面上的定性判断。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最终被多元价值观所代替，后来出现了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等学说，但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研究一直是最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本质来研究人类本质。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规则的研究，无论是单个村落、部落的文化本质还是族群与区域文化的本质研究，都需要超越纷繁复杂的日常生产生活表象，了解蕴藏在被研究对象和被研究文化之后的规则和逻辑，把实践行动者自己没有用明白的语言表白的道理，经研究者的再创造用语言表达出来。对于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更需要超越个案和调查点的局限，立足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历史宏观分析，总结一般的理论与方法。

从研究的积累和层次上看，人类学者从单一的村落研究、个别的民族开始再到族群与区域研究、泛文化比较符合客观规律。单一的村落研究好比人类学者在学科中学走路的阶段，族群与区域研究好比跑步的阶段，泛文化比较好比起飞的阶段，不经历前面的阶段，不积累相应的学术根底，一开始就介入泛文化、介入

宏大视野的研究往往容易流于空谈，好比空中楼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微观的层次，而要循序渐进，逐步介入中观（族群与区域研究）、宏观（泛文化比较）的领域。从整个中国人类学界目前的积累来看，需要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入族群与区域研究，才能是更好的。当然，对于研究生和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还得老老实实经历各个阶段。

三

中国人类学界的本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我们知道，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是从对现代社会中现存的所谓简单原始的部落社会开始的，用埃里克·沃尔夫的话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民族”。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功能学派开始的，它注重对简单社会的共时性的研究，缺乏历时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缺乏“历史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方法，在人类学转向对复杂的文明的社会做研究时，是否“适用”？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和发展出什么样的分析性概念才能准确地认识其社会的本质？乔健教授认为：“由于传统的人类学方法主要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与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博大悠久的复杂的社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①显然，人类学的发展受到了挑战。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秉承历史向度的研究，一方面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可供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最早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

^① 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载于《新亚学术集刊》第6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8年。

学者大多是学历史或者是“国学”出身的，他们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要认清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非得从历史入手。自 20 世纪前半期开始，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都注意到与历史学的结合，把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融为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个特点尤其体现在深受美国历史学派和德国传播学派影响的华南地区的人类学“南派”研究取向上，以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中心形成相对注重以边疆少数民族为研究和族群文化区域类型的田野考察，其解析模式一般围绕着语言—文化的特征而得以呈现，调查“扩张研究的材料，证而不疏”，“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正如在 50 年代以后对各民族的研究，则更是从历史的向度进行的，即使在中国人类学重建 20 年来的今天，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取向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中国台湾和香港，都是始终如一地秉承着的，正如黄淑娉先生所言：“历史研究与现状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好传统，是在方法上可以贡献于世界人类学的”^①，21 世纪的中国人类学需要继承这种研究取向并多出精品，加强理论概括，加强与国际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探讨，或许更能实现当年马凌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研究文明社会”的期待，更能通达弗雷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预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士研究生们任重道远。

四

如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

^①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4 页。

方式。从学科发展历史来说,人类学经历了从知识到学科的制度化过程,到20世纪后半期,它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一种超现实的结构和心理研究趋势,使人们以为人类学是一门少数学者自娱的学问而与现实无涉,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边缘化”,与主流社会话语不和谐^①。但人类学研究的边缘视点和“异文化”视角使之能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比如说,人类学对民俗的研究已在改变人们对农民生活方式的看法,人们对他们的宗族观念、他们的民间信仰仪式等都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而不是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斥之。对人类学知识的应用要有一个普化的过程,让人类学的知识真正服务于人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走向人民”。这是知识回归大众、回报大众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增多,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类学研究的“异文化”视角为我们消解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提供了工具。可以预见,在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知识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会加大,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一门“显学”。

除了从知识和理念的层面间接回报社会以外,中国人类学带有更多的直接服务社会的性格。

人类学在中国的肇始与当时中国新兴知识分子对国家强盛的殷切愿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务实的态度恰恰反映在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如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身上。例如费孝通曾这样写道:“在解放以前,如上所述,推动我去调查研究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救亡问题,敌人已经踏上了我们的土地,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寻找民族国家的出路。这也就决定了我们调查研究的题目。”以应用为导向的人类学研究在二战后不断获得发

^① 孟宪范:《人类学应把重心放在应用研究上》,载于徐杰舜主编《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展。它使人类学家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去，凭借自身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来帮助人们适应变迁，推动变迁朝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在世界范围内，第三世界国家对理性地进行社会发展规划表现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许多国际组织开始介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政府对于合理的介入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正是这种介入使得应用人类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许多发展计划和项目都明确提出需要人类学家的参与，在此之上中国的人类学逐步步入了它的起步阶段。当然正因为是起步阶段，所以在应用研究的方式上相对就表现得比较单一，例如往往是与一些国际组织合作，与政府合作等。在中国，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他们在积累着自己的应用实践经验，同时这些人类学家也在纷纷致力于探索中国人类学应用实践的理论和方法。

现阶段人类学在中国应用实践的领域从主题上讲非常广泛，涉及了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移民、社区综合发展、卫生保健、妇女、教育、卫生等等。在发展类型上包括有增长型的发展计划（例如扶贫项目），也包括非增长型的发展计划（移民和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等），应用实践所涉及的地域横跨中国全境，同时也包括了农村和城市。以笔者自身为例，2000 年以来，笔者主持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族群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所合作的一系列项目。同时也与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 NGO 以及中国政府合作了一些应用项目。在笔者亲身所主持或参与的应用研究项目中，涉及农村的项目涵盖江西、安徽、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四川、甘肃、新疆、黑龙江、青海、宁夏、重庆和西藏等十几个省区。而城市项目则以笔者所在的广州市（作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几个城市之一）以及广东省境内的几个主要城市为主。笔者所关注的主题包括有农业、环境、教育、社区发展和移

民等几个方面。

任何学科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学科才能永葆青春，才能更好地发挥本身的应用价值。费孝通先生从广西大瑶山民族调查到江村调查到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沿边开放、民族关系等研究的轨迹，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的典范。21 世纪的中国是变迁的时代，就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讲到的那样：“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智力发展史和道德发展史上充满大事而多变故的时期，此时那经常掩闭着的发现和变革之大门洞开。”古老中国的变迁虽然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如果说经济的高速发展，制度与法治的健全，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为我们认识社会、反思文化、在实践中发展应用性研究、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那么，触目惊心的贪污腐化、丧尽天良的坑蒙拐骗、惨不忍睹的黄尘浊流、伤痕累累的青山绿水更让每一个学者觉得肩头责任之重大！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人类的迷惘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正为人类学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21 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拿什么奉献给我们身处的时代？奉献给古老而又焕发青春风采的国家？奉献给异常复杂多元而又充满希望的社会？如果我们从人类学的“整体观”、斯图尔德的社会文化整合水平等视角去看待，去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或许可以获得不少解决问题的灵感。

五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流。20 世纪 30 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1981 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授予单位，招收人类学的博士超过 20 年，培养了一批博士并成为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目前我系招收

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考古学四个专业的博士，但我们的培养方案中人类学始终是一条主线。2004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开始招收“历史人类学”专业博士。2002年人类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并获得“211”和“985”工程的重点资助，使我们有专项经费来组织科研和出版。我们计划“人类学民族学文丛”分系列出版，已经出版了我系老教授系列，包括杨成志、黄淑娉、容观琼、龚佩华等先生的文集（民族出版社），“考古学译丛”（岳麓书社），“田野调查系列”（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民本书系”（中山大学出版社），“都市与乡村社区研究系列”（民族出版社）等，优秀博士论文的出版就是计划中的一部分。

选择博士论文出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学位论文，是衡量学科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尺之一，我们把博士论文的写作视为博士生培养最重要的部分。一篇合格的人类学博士论文从写作到通过需要“过五关斩六将”，首先是选题计划，然后是试调查，作开题报告，进入正式的田野调查，论文初稿完成后举行预答辩，补充调查和修改论文，最后进行论文答辩。本次组织博士论文的出版，是从通过答辩的论文中挑选，并要求作者根据答辩委员会意见再作修改才入选的。

我系强调坚实的田野调查与独立的理论思考结合的培养方针，博士论文应该体现出办学的风格和学科发展的特点，本次博士论文的出版可以说是对我系学风和风格的一次检阅。我们期待着国内外学术界的批评和指导！

周大鸣

2006年2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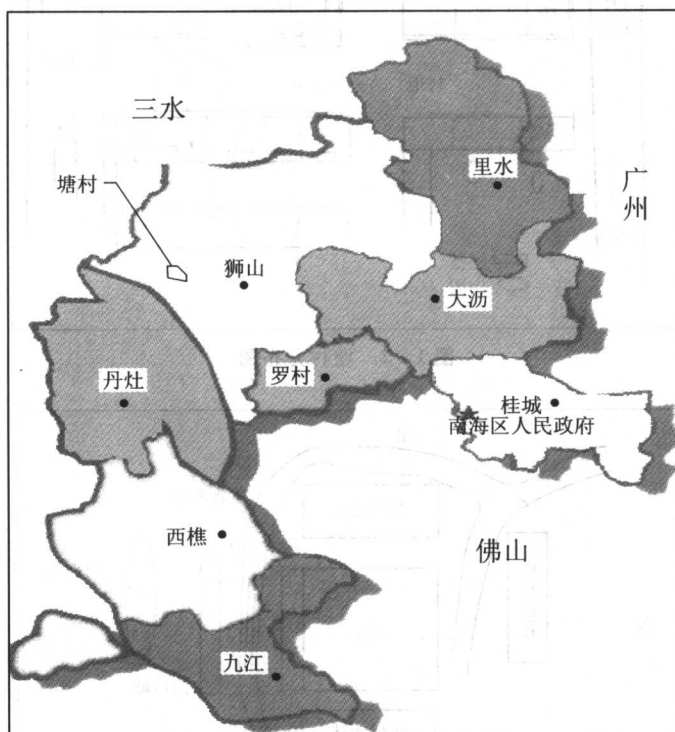


图 1-1 调查地点位置示意图

目 录

总序	周大鸣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 选题的缘起和过程	(1)
二 问题意识	(4)
三 人类学视野中的纠纷解决	(9)
四 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	(13)
五 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	(16)
六 调查方法与资料来源	(19)
七 研究思路	(24)
第二章 塘村：田野调查社区概述	(26)
一 村落起源	(27)
二 当地的家族结构	(30)
三 村庄管理	(43)
四 塘村的都市化	(48)
第三章 历史记忆的纠纷	(59)
一 族谱保存的记忆	(59)
二 被包围的村庄	(61)
三 土地争夺与械斗	(65)
四 事件的类型学	(68)
五 械斗与宗族竞争	(73)
六 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	(77)
